



MORAL
DIMENSION OF
SCIENTIFIC DEVELOPMENT

科学发展的 道德 之维

黄守红 著

湘潭大学出版社



MORAL
DIMENSION OF
SCIENTIFIC DEVELOPMENT

科学发展的 道德 之维

黄守红 著

湘潭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科学发展的道德之维 / 黄守红 著. —湘潭: 湘潭
大学出版社, 2011.4

ISBN 978-7-81128-293-1

I. ①科… II. ①黄… III. ①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研
究—中国②道德—研究—中国 IV. ①D616②B8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55516 号

科学发展的道德之维

黄守红 著

责任编辑: 陈美桥

封面设计: 孙艺哲

出版发行: 湘潭大学出版社

社 址: 湖南省湘潭市 湘潭大学出版大楼

电话(传真): 0731-58298966 邮编: 411105

网 址: <http://xtup.xtu.edu.cn>

印 刷: 国防科技大学印刷厂

经 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9

字 数: 230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4 月第 1 版 201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1128-293-1

定 价: 22.00 元

(版权所有 严禁翻印)

本书系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科学发展的道德维度研究”(2010YBA219)成果,获湘潭大学优秀著作出版资助。

目 录

前言	(1)
绪论:科学发展为何诉求道德	(6)
第一章 道德之维论科学发展的缘起	(20)
第一节 加强发展观的道德考量及价值	(20)
第二节 发展观的历史流变和现代嬗变	(34)
第三节 科学发展观的发展	(55)
第二章 道德之维建构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基础	(74)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经济伦理思想	(74)
第二节 中西道德自律论	(95)
第三节 现代性视阈下的德育功能论	(106)
第三章 科学发展的道德阐释	(123)
第一节 科学发展实践的道德考量研究述评	(123)
第二节 历史演进中的科学发展思想及其道德内涵	(160)

第三节	科学发展观的伦理意蕴	(173)
第四节	多维视阈里的科学发展观	(188)
第四章	科学发展的道德实践	(200)
第一节	将科学发展观升华为全社会道德共识	(200)
第二节	积极整合中西文明	(211)
第三节	加强全民思想政治教育	(220)
第四节	构建学习型社会	(249)
第五节	构建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	(256)
结束语	现代性的咏叹	(266)
主要参考文献		(271)
后记		(275)

前 言

发展既是时代主题,更是时代问题。发展实践表明,设若沿袭旧有发展观指引下的发展实践,则“大多数国家的发展都注定要失败”,“发展问题是相对于少数人的特权,而不发达则继续是广大多数人的命运”^①。与此同时,“发展异化”、“反发展”、“伪发展”的呼声不绝于耳,GDP 的增长成了“丰裕的异化”。“异化”了的发展观指引下的发展实践使人性遭到了扭曲,拜金主义、纵欲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充斥人间;华尔街的金融海啸、哥本哈根的漫骂推诿,更给“2012”的人类末日科幻平添了几分现实可能。

较早意识到此点的是经济与人道主义运动奠基人路易·约瑟夫·勒布雷特,他将发展定义为:“一个特定人群及构成它的所有邻近人群单位,以可能的最快节奏,以可能的最低代价,并考虑到存在于(或应当存在于)这些人群与邻近人群之间的团结纽带,以较少人道向较多人道阶段的一系列过渡。”^②在此价值观指引下,

① [美] 德尼·古莱:《发展伦理学》,高铨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31—32 页。

② 转引自[美] 德尼·古莱:《发展伦理学》,高铨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6 页。

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开始了发展的道德伦理价值诉求。此后,冈纳·缪达尔在1968年的研究著作《亚洲的戏剧》中承认发展是充满价值观的运动,经济学家本杰明·希金斯也说:“哲学家必须加入发展队伍,如果没有发展哲学的明确概念,这个队伍就成了一个简单的特定使团。”^①

—

将道德考量纳入发展观的理论建构与发展观的现实实践,从经济学视角探求如何采用更为道德的手段实现经济社会发展,是国内外学界对诸如“反发展”、“伪发展”等诘问理性沉思的结果。

马克斯·韦伯和货币主义大师密尔顿·弗里德曼等人认为在经济领域里应保持“道德中立”状态,让经济学成为一门纯粹意义上的具有严格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的科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美国发展伦理学先驱德尼·古莱等人,则坚持要在经济学领域引入伦理考虑(ethical consideration),反对现代经济学非伦理主张(non-ethical consideration)。普世伦理的倡导者孔汉思、卡尔等人认为普世伦理不仅可能,而且应该是“最高限度的”(maximum)或“较深厚的”(thicker),至少是一种不可消除的“底线规范伦理体系”。而以李约塔尔、福柯等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者则根本否定普遍理性主义伦理学的可能性,认为文化的“歧义多样”和“分裂冲突”才是现代社会的圭臬,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正是此种认识的极端表现。

^① 转引自[美]德尼·古莱:《发展伦理学》,高钰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3—4页。

国内学者对发展实践的道德关怀始于改革开放初期。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首先确立了道德在经济学领域里的重要地位,认为道德力量之于经济的调节作用超越了市场与政府。其后,何清涟、樊纲、张曙光、汪丁丁等人则开始了“经济学是否需要道德”“经济学如何道德”之探索。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市场规律及其求利原则已成为社会经济运行和发展的一般规律。与此同时,原有维系国人内在心灵秩序结构与外在社会制度结构恒稳状态的社会公共道德在“市场”与“经济”的冲击下失衡了。社会公共道德失范现象层出不穷,资源能源浪费现象屡见不鲜。有鉴于此,以万俊人等为代表的当代人文学者于世纪之交发起了对市场经济本身的道德性及其理解之“市场经济的道德维度”^①的探讨。

自此,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如冷溶、严书翰、靳辉明、万斌等在思考当代中国发展问题时开始了从人文关怀角度问“道”于“德”的思考历程,他们对科学发展观的政治意义、哲学基础等作了深刻的理论阐释,这些研究对有效克服市场缺陷、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起到了较大的理论助推和实践引航作用。到了2009年,尽管所谓“中国模式”在国际金融危机和共和国六十华诞背景下成为全球热门话题,但以李君如、许志功、李景源、邱耕田等为代表的学者们却竭力在西方媒体“捧杀”中国时保持清醒态度,主张“特色”慎提“模式”,认为中国的发展虽在进步但又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中国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需要不断输送“道德的血液”。

^① 关于市场经济的道德维度论述,可以参见施国光:《市场经济的道德风险》,《浙江社会科学》1994年第1期;汪丁丁:《市场经济的道德基础》,《改革》1995年第5期;万俊人:《论市场经济的道德维度》,《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2期;龙兴海:《论道德与市场经济秩序》,《道德与文明》2000年第6期;窦艳华:《论市场经济的道德维度——兼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道德“代价论”》,《新疆财经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等论著。

二

综观国内外学界对科学发展问题的研究,“道德中立”论坚持历史虚无主义立场,脱离了人与社会的具体实际,主观地、抽象地将人所从事的经济活动视为一门纯粹意义上的具有严格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的科学,是发展观上的机械论;普世伦理从一开始就忽视了经济基础对于社会意识结构的决定作用,其理论即使在全球化的今天依然显得苍白无力。

事实上,在发展呈现出明显阶段性特征的当今中国,有效解决发展问题,弥合发展带来的社会分层鸿沟,对人文底蕴深厚的中国实际而言,理想的选择是探求出一条如何用更为道德的方式实现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对此,国内外学术界已在发展的观念设计和现实实践层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理论铺垫。

胡锦涛同志指出:“要把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等方面面的知识、方法、手段协调和集成起来,对科学发展观进行周密的科学解释,为科学发展观提供坚实的科学理论基础。”有鉴于此,本书的意义在于:

第一,对发展问题进行道德层面的思考是科学发展观研究的一个具有创造性的思路,它突破了学术界从发展论发展的做法,改变了经济学之于发展问题的话语主导地位,从而为科学发展提供哲学和伦理支持,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学术价值;

第二,从科学发展的道德维度深入分析我党清醒认识和科学回答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经验教训,对解决当今发展问题可能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第三,从人类历史的角度和全球的角度去分析和比较全球问题而不仅仅局限于中国,将落实科学发展与道德问题、道德考量以

前 言

及思想政治教育结合起来,探究科学发展中的道德因素以及二者的平衡,用交叉学科的材料与方法成著,是本文的创新之处。

绪论：科学发展为何诉求道德

一

曾几何时，“发展”一词是一切价值诉求和现实判断的“金规则”，如同人类不同文明古已有之的共同伦理信念一样。在历史唯物主义高度，发展亦是人类求得生存于自然、求得幸福于自身的最佳现实实践诉求。发展的目的，是为了创造出这样一个社会，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全面发展的前提条件，最终实现人和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从马克思主义视阈出发，全面生产理论，包括物质的、精神的生产活动乃是构成人类历史的首个必要前提。然而，在现今这个高度文明化的社会里，现代性视阈里的发展却渐渐地变得面目狰狞起来。人类早自原始洪荒年代就已开始了的发展观的理论建构和现实实践，在今天却遭到了前所未有的理论质疑和实践抵触。人的全面发展与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以至于“反发展”、“伪发展”、“异化发展”、“零发展”等等斥责声音不绝于耳。

然而事实不容改变。发展是人类得以生存于自然界的必需，

发展也是人类幸福的永恒诉求。整部人类史，“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①。人类就是要通过发展实践，不断生产人类生存所需的物质生活资料和精神生活资料。离开了发展，人类就失去了生存的物质基础。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中指出：“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②所谓的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的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但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因此物质资料的生产便是维持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历史活动”，是“一切历史的一种基本条件”^③。所以，全部人类史，也就是一部物质资料的生产史。

毫不讳言，21 世纪的物质生活，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丰富了，我们创造自己物质生活的能力和手段是以往任何时候都不可比拟的。我们能够“坐地日行八万里”，也能够“巡天遥看一千河”。我们创造了机器人、转基因食品，我们也创造了克隆技术、试管婴儿、卫星通讯、信息高速路……可是我们却无法使自己的生活过得更惬意一些，淡定一些，从容一些，宁静一些，平和一些……我们不断创造财富，但我们的钱包还是入不敷出；我们不断攻克疾病，但病毒依旧猖獗；我们不断宣扬友善，但恐怖暴力仍然嗜杀成性；我们不断制造娱乐，但烦恼始终如蚊在耳际嗡鸣；我们不断维护公平正义，但战争依旧成为现实的注脚；我们不断消弭隔阂，但种族隔膜一贯如旧……当 21 世纪已过十数寒暑，美好生活的预言家们却已战战兢兢，底气不足。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2 卷，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131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60 年版，第 23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78 页。

二

在科学和技术的进步没有实现巨变以前,人类的发展一直磕磕绊绊。我们勤劳,我们也能吃苦,我们也在思考,可是我们的勤劳、吃苦和对我们生产劳动实践的思考却无法让我们的物质生活更充实一些,更丰裕一些,更满足一些,也无法让我们的精神生活更多一些从容,更多一些色彩,更多一些音乐。在精神领域,东方的天命、西方的上帝,被人所创造却一直奴役、统治着人。它们给人以内心的宁静、心灵的平和,它们教人从善、让人遵从。可是它们也给人以愚昧,使人无知。温顺的服从、愚笨的忠诚,最终并不能给人以真正的自由、幸福,甚至尊严。

科学和工具理性拯救了人类自由和尊严,也拯救了人类发展历史。从此,人类历史改天换地。

自然科学在人类实证领域的发展,使人以及人的自我意识渐渐从纷繁复杂的大千世界中独立了出来。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首先表现为上帝和诸神在人心目中地位的淡化。自然科学领域里一系列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发现,为文艺复兴和稍后的启蒙运动驱除上帝以及诸神在人心灵中的地位提供了足够的力证。上帝是抽象的精神存在。人类的伟大,在于人类可以创造一个上帝,让上帝来为人类服务,让主观虚幻的上帝帮助人类战胜客观实在的困难。在生产力低下的社会,上帝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推动社会不断进步和发展的先进生产力,它使人们不再畏惧大自然的电闪雷鸣、冰霜雪雨,它使人有了无尽的精神动力,在无助的时候,上帝总是会给人带来及时的精神支持和鼓励。

但人类的虚弱也正在于此。人类愿意接受一个虚幻的上帝权威来统治人间。人们在教堂里的虔诚、对无聊的尸骸和世俗的面

包充作圣物和祭品的顶礼膜拜，正表明了人类的虚弱。可是人类是有理性的。“自然界的最高立法必须是在我们心中，即在我们的理智中。”^①人类的理性，使人意识到了自己也是自然的存在物。而且，人不仅仅是自然存在物，而且是类的存在物；生产生活就是类生活，人的类特性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人的活动不是在上帝铸就的模块里面填塞，而是烙上了人类主观精神烙印的创造。人类的理性让人抛弃了上帝，并在日后的生活中渐渐摧毁了上帝。敢于并且能够亲手毁掉自己的创造物，也是人类的伟大之一。人类不再愿意继续在上帝的天国里，驾着诸神仅可感受、不可也根本无法触摸的精神的翅膀，从无知的地方来，到无知的归宿去，仅仅在精神麻醉的满足中，得到一番上帝的夸奖以及自娱自乐。科学和理性让人类终于明白了，人类本性是可变的、历史的。整个所谓的人类史不过是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劳动是人存在的必须。人类历史的前提，是人类劳动和劳动能力的不断提高。人是什么样的，取决于人所进行的生产劳动，包括精神的生产和物质资料的生产。

三

当上帝已经不再作为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生产力之一的时候，科学和理性开始确立了它们在人类发展实践和观念建构中的主导地位。而当科学和理性一旦成为了人类发展实践的价值评判原则的时候，人类的发展就取得了难以想象的成就。依靠科学，我们实现了对大自然的统治，完成了对人类自身的超越；依靠科学，人不再从人间走向天国，而是从天国回到了人间。人的回归，人性

① [德]康德：《未来形而上学导论》，庞景仁译，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93页。

的复原,不止是复归和复原了人所应有的地位和自由,也实现了人真正的尊严和价值的自我占有。而工具的性能和效用让人类更加喜爱科学的甜蜜。人类自有制造和使用工具的喜好,制造和使用工具是人类在与大自然抗争过程中积累的优良传统和一贯优势。从木棍和卵石,到铁制生产工具的发明和应用,再到蒸汽机、电力机器和计算机技术的普及,人类在发展实践领域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飞跃,也获得了一次又一次的丰收。

可是,人的悲哀却正在于此。人类赶走了上帝,人类从自然中独立了出来。然而,人类又用新的“上帝”——科学和工具理性来主导了人类自身追寻幸福的发展实践。人类中心主义,更似乎是人类科学主义和工具理性主义的代名词。而且,人类所确立的那个“人”,其实并不是人类自身,而是科学和工具理性操纵之下的人类的欲望,是科学和工具理性让人类变得陌生了起来。科学和工具的魔力是无边的,其潜能还没有被人所绝对认识和应用。而自然,和早已远离尘世的上帝,在科学和工具面前,只不过是落后和愚昧的象征,是科学和工具力量的试验场。

一度以来,科学和工具主导下的发展,将人、自然和上帝统统赶出了人间。一切以工具为手段,以是否合乎科学为标准。科学可以促使工具的不断改良和更新,而新的工具又可以为科学在更高平台上的更快发展提供物质基础。上帝在人间的死亡,并没有让人获得真正的、持久的解放和自由。人类似乎还不习惯于没有外在精神寄托的日子。当尼采喊出了“上帝已死”的口号的时候,整个世界的精神大厦似乎一夜之间就已经垮塌了。然而,新的精神大厦,就在上帝的天国灭亡的同时,悄然铸就。而铸就这一精神大厦的两大支柱,就是科学和工具理性。

科学和工具理性给人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物质繁荣时代。然而,悖论恰恰在于,物质文明的极大富足,却并没有带来相应的精神文明的丰裕。甚至,连人本身,都异化了。科学和工具让人类变

得疯狂,让人类无比自负。在科学和工具眼里,什么人类情感、什么人间正义,都不会在原子弹的蘑菇烟云中得到维护和实现。一边是子弹的轻灵、炮弹的怒吼、机器的轰鸣,另一边却是敌人的眼泪、弱者的哭喊、自然的灾难,或者动物的悲恸。真正的人类解放,到目前为止,从来没有实现过。人们为了自由和平等,在经济社会中生产了商品、发明了钞票,然而,正如人类创造了上帝而后来上帝又统治了人类一样,人们将自己的全部幸福诉求都归结于物和钱的积累了。

马克思指出,在钱面前,“一切神都要退位。钱蔑视人所崇拜的一切神并把一切神都变成商品。钱是一切事物的普遍价值,是一种独立的东西。因此他剥夺了整个世界——人类世界和自然界——本身的价值。钱是从人异化出来的人的劳动和存在的本质;这个外在本质却统治了人,人却向它膜拜”^①。钱是人间至善。马克思有一段关于钱的精彩的、形象的“自白”,揭露了钱统治人的赤裸裸的、丑恶的本质:“货币的特性就是我——货币持有者的特性和本质力量。因此,我是什么和我能够做什么,这决不是由我的个性来决定的……我是一个邪恶的、不诚实的、没有良心的、没有头脑的人,可是货币是受尊敬的,所以,它的持有者也受尊敬。货币是最高的善,所以,它的持有者也是善的。此外,货币还使我不必为成为不诚实的人伤脑筋,所以我事先就被认定是诚实的。”^②为了钱,人类已然“非人”。凶残却又可怜的资本家被资本奴役着,而他反过来又更加严酷地奴役别人。在他的奴役下,“工人完全像每一匹马一样,只应得到维持劳动所必需的东西”^③,也即是说,工人是,且只可能是资本家为了资本增值、使钱能够生钱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4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48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32页。